

丘培培

与苏智良 陈丽菲 合作

丘培培 译 周游力 协译



日本帝国 的 性奴隶



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丘培培

与苏智良 陈丽菲 合作

丘培培 译 周游力 协译



日本帝国 的 性奴隶



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2017-78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帝国的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 丘培培，苏智良，陈丽菲著；
丘培培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203-2899-9

I. ①日… II. ①丘… ②苏… ③陈… III. ①军国主义-性犯罪-史料-
日本 IV. ①K31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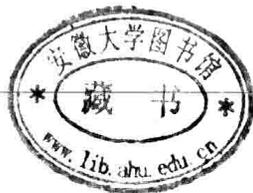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335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李 剑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 © UBC Press, Vancouver, Canada, 2013.

《日本帝国的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2017 香港大学出版社版权所有。未经香港大学出版社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电子或机械）方式，包括影印、录制或通过信息存储或检索系统，复制或转载本书任何部分。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授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鸣 谢

本书的调查与撰写曾得到众多个人和机构的热心帮助，谨此表示最深切的谢意。首先要感谢的是那 12 位勇敢地站出来讲述自己在日军慰安所中所遭受的折磨及战后苦难经历的女性。她们是：陈亚扁、黄有良、雷桂英、李连春、林亚金、陆秀珍、谭玉华、尹玉林、袁竹林、万爱花、周粉英、朱巧妹。她们口述史的出版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得以了解这一页重要的历史。

对本书的研究、写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不胜枚举，无法逐一表达感激之情。此处鸣谢如有疏漏，敬请原谅。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为我们收集原“慰安妇”口述史提供了直接帮助的日军慰安所幸存者的亲属及志愿研究者。其中包括幸存者袁竹林的养女程菲、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程绍蟾、海南省保亭县南茂农场志愿调查员陈厚志、云南省保山市原史志办公室研究人员陈祖梁、海南省原史志办公室主任符和积、幸存者李连春之女高玉兰及儿媳张学芳、海南省陵水县田仔乡原文化站站站长胡月玲、幸存者周粉英之子姜伟勋、陕西省孟县志愿调查员李贵明、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史志办公室原主任沙必璐、海南省陵水县政协原主席苏光明、幸存者雷桂英的养子唐家国、幸存者谭玉华之子谭毛湘、幸存者陆秀珍的继子王安章，及幸存者朱巧妹之子周燮。

由衷感谢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陈俊英，“敦促日本战后补偿国际联盟”执行长有光健，及中国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春立为笔者提供了宝贵的日文资料。感谢纽约非营利机构 People Inc. 财务总监张越女士不远万里将笔者所需资料由中国带到纽约。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负责人王成志博士、日文藏书负责人野口幸生博士、特殊馆藏负责人 Ria Koopmans-de Bruijn 女士对笔者调查的鼎力协助。笔者的调研也得到了瓦萨大学图书馆 Barbara Durniak 女士及瓦萨大学科研基金办公室 Amanda Thornton 女士的倾心帮助。上海师范大学诸多研究生和笔者在瓦萨大学的学生助手 Xuan Liu、Sally DeWind、Maria Ichizawa、Charlotte

Ong、周游力、Hayley Rothman、刘均锐、郭泊羽、Anthony Chan、胡小庭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周游力还参加了本书中文版初稿部分章节的翻译，刘均锐参加了索引的编写，在此一并致谢。此外，笔者借此机会对瓦萨大学毕业生 Lesley Richardson 和 Leann Peterson 表示感谢。笔者对中国“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始于审阅 Lesley 就韩日“慰安妇”索赔运动撰写的毕业论文；Leann Peterson 曾参与朱巧妹口述史初稿的英文翻译工作。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诸多此前出版的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但因篇幅所限，难以逐一列出，谨此向先行研究者一并致谢。特别感谢康健律师向笔者提供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的相关信息；感谢惠泉女学园大学名誉教授、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所长内海爱子、冈山大学名誉教授石田米子，及战争与和平妇女运动展览馆（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WAM）负责人池田惠理子的宝贵帮助。在本书英文版撰写的不同阶段，多位学者、同人抽出宝贵时间阅读书稿并提出宝贵建议，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瓦萨大学 Lizabeth Paravisini-Gebert 教授不仅仔细阅读了初稿全篇，并为本书的撰写与出版提供多方支持；Seungsook Moon 教授、Katherine Hite 教授分别从性别研究、社会运动，及记忆研究的角度对初稿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华东师范大学姜进教授热心促成笔者与苏智良、陈丽菲两位教授的合作，并对初稿提出建设性意见；哈佛大学 Karen L. Thornber 教授对完善修订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对本书出版给予了热忱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孙伶俐博士从法学研究的角度，仔细阅读了有关中国“慰安妇”法律诉讼的章节；日本战后赔偿联络网有光健执行长阅读了初稿并就“慰安妇”索赔运动提供信息；瓦萨大学 John J. Ahern 教授、Bryan W. Van Norden 教授审阅了本书初稿，并给予笔者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顾宁研究员、日本研究所李薇所长、美国禾大公司（Croda Inc.）孙金霞博士对本书的写作倾心相助，并提出中肯建议；瓦萨大学苏福兵副教授、周宇教授不仅抽出宝贵时间阅读书稿，并与笔者就“慰安妇”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瓦萨大学教务长 Jonathan Chenete 教授就本书前言的写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土屋浩美副教授、Diane Harriford 教授，及美国 Bridgewater Associates Inc. 中国区总裁王沿先生也在百忙中阅读了书稿的不同章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特邀审稿人提供了中肯评价与建设性意见，对书稿的进一步完善至为关键，笔者不胜感激。

笔者由衷感谢瓦萨大学计算机学系行政助理 Linda Wood 女士为校阅本书初稿花费的心血。感谢《新民晚报》记者方毓强先生为本书提供日

军在上海建立的第一家慰安所“大一沙龙”的日本地图照片。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者吴俊范女士为制作 12 位幸存者受害地点图初版所做的工作。

美国新泽西州帕利赛兹帕克镇艺术家 Steven Cavallo、镇长 James Rotundo、副镇长 Jason Kim 百忙之中向笔者详尽介绍美国第一座“慰安妇”纪念碑的建立沿革。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资深组稿编辑 Emily Andrew 女士、编审 Joanne Richardson 女士，及制书编辑 Megan Brand 女士为本书英文版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们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令人钦佩。香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何舜慈女士、编审谢伟强先生、策划编辑梁悦生小姐，及原助理编辑、版权经理梁倩仪小姐为本书中文版的发行尽心尽力，特此感谢。由衷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庆红编辑为出版简体中文版付出的心血。

本书英文版的研究与写作，先后得到瓦萨大学 Emily Abbey 基金、Lucy Maynard Salmon 研究基金和 2005 届毕业生捐献基金的资助。上海师范大学资助了部分实地调查及访谈的费用。本书英文版的出版承蒙加拿大政府图书基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文学艺术委员会、瓦萨大学 Susan Turner 基金赞助；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承蒙瓦萨大学 Salmon 基金及 Tatlock 基金赞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笔者及合作者衷心感谢我们的家人。他们长期以来无条件的支持，使这一重要的研究课题得以完成。

前 言

刘面换是家中独女。在她之前，刘家的几个孩子都不幸夭折，小面换一出世就被父母视为命根子。然而，在刘面换未满16岁那年，日军占领了她的家乡，将她从母亲眼前抓走，关进军事据点充当日本兵的“慰安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悲惨的经历仍然是刘面换心头流血的伤口。回忆起慰安所里骇人的折磨，她止不住泪如泉涌。

我生在山西盂县羊泉村。战前家里生活虽不富裕，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忧愁。

那年我将满16岁，一队日本兵突然进了羊泉村，包围了村庄。记得是采嫩柳叶、榆树叶吃的时候。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家早晨吃了早饭，母亲在炕上，父亲去地里干活了。忽然听到有人高叫：“开会！开会！”后来听说这人是日本兵的翻译官。所有的村民被日本兵赶到草堆边的空地上，全部蹲下，然后日本兵就开始在里面寻找“花姑娘”。有个30岁左右的军人，汉奸们叫他“队长”，走到我面前，瞪着眼看我，让翻译对我说：“你长得很漂亮。”这样我就被日本兵挑上，五花大绑地与其他两个女孩一起被押上了路。我妈哭叫，没有用。我不停地反抗，遭到日本兵的毒打，左肩受伤，至今活动不便。

约走了三四个小时，我们被日本兵押到了进圭村，关进了日军的据点。当天晚上我就被日本兵强奸了。我又痛又怕，吓得缩成一团，恨不得钻到地里躲起来。以后日本兵开始白天黑夜地轮奸我，每天至少有五六个日本兵进来。那个队长每天晚上来强暴我。那时我还未满16岁，还没有月经。遭到日军的摧残后，下身糜烂，全身浮肿。我疼得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只能在地上爬，连上厕所也只能爬着去，每日生活如地狱。

日军让当地的人送饭进来，每天只有两顿，一顿只有一碗玉米

2 前 言

粥。我房间的门口由汉奸看着，无法逃跑。我当时的身体状况也根本不可能逃跑。我曾经想死，又想念着爹娘，想着爹娘不知怎么念着我，我不能死，只有忍耐着。

这时进圭村的一个亲戚知道了我的情况后，跑到羊泉村去告诉了我的父母。我父亲把家中仅有的一圈羊给卖了，得了100多银圆，便跑到进圭村去求日本兵。可怜我的父亲，他趴在地上磕头，求他们开恩放了他女儿。日本兵不理。又跟翻译说，身子养好了就送过来。当时我已被关押了40多天。大概日本兵看我身体确已不行了，不能再做他们的发泄工具了，便收下了银圆，把我放了。

看到父亲来救我，我哭啊哭啊，连爬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父亲将无法走路的我放在驴背上驮回了家。我一面在家养伤，一面还得提防日本兵又来抓我。于是我父亲挖了个地窖，将我藏了进去。果然，在半年之中日本兵真来找过几次，因为我事先都躲到地窖里，才没有被鬼子再抓了去。

刘面换的家乡孟县于1938年至1945年被日军占领。孟县位于日军占领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交界处，在日军频繁的扫荡中备受摧残。大批当地妇女与刘面换一样成为日军性犯罪的受害者，时刻生活在暴力骚扰的恐怖之中。这无时不在的恐怖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得以解除，但战争造成的创伤和贫穷继续困扰着她们的余生。在苦难中挣扎了一辈子的刘面换于2012年4月12日与世长辞。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不计其数的中国妇女像刘面换一样，遭到日军残酷的性奴役。然而，她们的悲惨遭遇过去却鲜为国际社会所知。战后几十年来的社会政治环境迫使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长期陷于沉默，而民族国家英雄主义的抗战叙事亦对她们的苦难遭遇讳莫如深。直到近二十年，在韩日“慰安妇”索赔运动的激励下，在中国民间团体、研究者和法律专家的支持下，这些幸存者才开始公开讲述她们的遭遇。她们的故事揭露出日军性奴役制度最残忍的一面，让世人看到中国“慰安妇”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敌对国的国民所遭受的特别惨无人道的蹂躏。

自从原“慰安妇”打破沉默讲出自己战时的经历，那些企图将她们的故事从公众记忆中抹去的势力便从未停止过活动。2012年，日本官方派员赴美，试图拆除建在新泽西州的一个“慰安妇”纪念碑。此举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座铜面石底的小纪念碑于2010年建成，位于新泽西州帕利赛兹帕克镇（Palisades Park Borough）。碑面上刻着如

下几行献词：

谨此纪念那些被日本帝国政府武装部队掳走的 20 余万妇女和少女
1930 年代—1945 年

这些被称为“慰安妇”的女性所遭受的人权侵犯不应被任何国家和人民忽视
让我们永志不忘那骇人听闻的反人类暴行

纪念碑的设计者 Steven Cavallo 告诉笔者，他是从 2008 年开始创作关于“慰安妇”题材的艺术作品的。当时他正在举办一场个人画展，展出的作品取材于遭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二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裔、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以及日军“慰安妇”。参与筹建这个纪念碑的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一位日裔艺术家。然而，2012 年 5 月 6 日，四名日本国会成员突然造访帕利赛兹帕克镇，要求当地政府拆除这座纪念碑，并声称：“所谓军队胁迫妇女属不实之辞。”^① 他们的要求当即被镇长 James Rotundo 及副镇长 Jason Kim 拒绝。但此后不久便有人在白宫官方网站上登出一份请愿书，发起签名运动，要求奥巴马政府下令“拆除该纪念碑，不支持任何与该问题相关的、针对日本人的国际挑衅”。^② 这场签名运动一个月内征集了 28000 多个签名。据报道，大部分签名来自日本。某些日本政治家及其支持者的网站对此大肆宣传，其中就包括前往新泽西的日本代表团中的两名国会成员。^③

纪念“慰安妇”所引起的国际争议恰恰凸显了记忆的力量和把幸存者的经历载入历史的重要性。令人深思的是，在那场战争悲剧发生 70 年后的今天，日本和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为亚太战争期间“慰安妇”问题的真相而争论。对于战后出生的人而言，“慰安妇”的遭遇既遥远又难以置信。弃之不问或任由历史将之尘封似乎来得更容易、更轻松。然而，如此大规模、如此惨痛的生灵涂炭，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忽视；我们如何认识和记住过去发生的一切，不仅影响我们的今天，更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讲述“慰安妇”的故事绝不是要羞辱日本人，正如纪念被屠杀的犹

^① Daisuke Shimizu, “‘Comfort Women’ Still Controversial in Japan, S. Korea”, *Asahi Shimbun*, July 14, 2012. 取自 <http://ajw.asahi.com>, 2012 年 7 月 30 日。

^② 取自 <http://petitions.whitehouse.gov/>, 2012 年 6 月 6 日。

^③ Josh Rogin, “Japan Comfort-Women Deniers Force White House Response”, *Foreign Policy*. 取自 <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 2012 年 6 月 6 日。

4 前 言

太人和遭受原子弹伤害的日本人并非要让德国人和美国人名声扫地。恰恰相反，这样做是为了增进日本人民与亚洲邻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互信。以国家荣誉的名义漠视并否认普通人的苦难不仅谬误而且危险：国家机器惯于利用此类借口把民众拖入战争，剥夺其基本权利，并伤害他们。对于那些真心希望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日军“慰安妇”问题并抚平战争创伤的人来说，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正视战争对人类生命的侵犯，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只有真正了解“慰安妇”的苦难，才能正确认识日军战时慰安所的实质和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本质。正如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卜正民（Timothy Brook）及其他学者在研究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历史时所指出的，为了真正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认识到苦难是历史研究的主课题而非副产品。^①

中国大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为了铭记战争的灾难，本书将中国“慰安妇”的苦难经历连同大陆人民的惨痛记忆一并记载，以求加深我们对那段苦难历史的认知，进而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与和平。

^① 见 Timothy Brook, “Preface: Lisbon, Xuzhou, Auschwitz: Suffering as History”, in *Beyond Suffering: Recounting War in Modern China*, ed. James Flath and Norman Smith,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 xviii。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部分 战争记忆

第一章 日本侵华战争与“慰安妇”制度	(21)
第二章 日军大规模暴力强征“慰安妇”	(36)
第三章 建在中国大陆的日军慰安所实况	(51)
第四章 “慰安妇”制度下的性犯罪	(67)

第二部分 幸存者证言

第五章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82)
第六章 华中与华北战区	(101)
第七章 中国南方前线	(121)

第三部分 追索正义

第八章 无愈之伤	(143)
第九章 索赔运动	(152)

2 目 录

第十章 诉讼之路	(163)
第十一章 国际支援	(178)
结 语	(185)
参考文献	(190)

图 目 录

- 图 1 标有设在上海的第一家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位置的日本地图 (25)
- 图 2 曾被日军霸占用来做慰安所的窑洞。幸存者万爱花 1943 年就被囚禁在这里 (43)
- 图 3 幸存者黄有良带来访者参观海南岛藤桥日军慰安所遗址 (52)
- 图 4 幸存者袁竹林战时被日军囚禁在这个设在旧庙中的慰安所里 (54)
- 图 5 位于上海东宝兴路的“大一沙龙”日军慰安所旧楼 (57)
- 图 6 幸存者李连春 1943 年逃离松山日军慰安所后在深山中的藏身之所 (81)
- 图 7 幸存者雷桂英于 2006 年在上海为来自加拿大的教师与学生做报告 (82)
- 图 8 幸存者周粉英于 2007 年向调查者讲述她战时的遭遇 (89)
- 图 9 幸存者朱巧妹 2001 年在家里接受对她战时受害事实的公证 (94)
- 图 10 幸存者陆秀珍于 2000 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研讨会上讲话 (97)
- 图 11 1998 年袁竹林在多伦多控诉日军在亚太战争中的罪行 (102)
- 图 12 幸存者谭玉华 2008 年在自家门前留影 (107)
- 图 13 幸存者尹玉林 2001 年在自家窑洞中祈祷 (112)
- 图 14 幸存者万爱花在山西太原自己家中讲述她遭受日军拷打的情形 (115)
- 图 15 幸存者黄有良 2000 年对调查者讲述她在日军慰安所中的遭遇 (122)
- 图 16 幸存者陈亚扁 2003 年在自家屋前留影 (125)

2 图目录

- 图 17 幸存者林亚金 2007 年在上海参加中国“慰安妇”
资料馆开幕式 (129)
- 图 18 幸存者李连春于 2001 年在她的女儿家接受访谈 (134)
- 图 19 日本侵略战争使朱巧妹全家陷入赤贫 (148)
- 图 20 幸存者朱巧妹病卧家中 (149)
- 图 21 幸存者毛银梅在自家屋前与苏智良及来自德国和日
本的学者合影 (165)
- 图 22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为海南慰安所幸存者杨阿婆
建的墓碑 (170)
- 图 23 日军慰安所受害者陆秀珍于 2005 年 11 月 24 日
去世 (180)
- 图 24 幸存者谭玉华向来自北美的历史教师讲述自己在日军
占领下的遭遇 (182)

表 目 录

表 1	1940 年设在上海虹口区的日军慰安所	(34)
表 2	日军慰安所收费举例	(62)

引 言

本书译自关于中国“慰安妇”的首部英文专著,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① 中译本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首发繁体字版。此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的简体字版系根据繁体字版勘校而成。“慰安妇”一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20世纪30年代初至1945年,日本帝国军队在亚洲强征大量妇女,将她们称为“慰安妇”,投入军用“慰安所”,肆意蹂躏。“慰安妇”是日文同字词的直译。“慰安”二字的含义与受害女性在日军慰安所里的悲惨遭遇大相径庭,因而这个掩饰罪恶的词语是不应当用来指称那些受害女性的。本书之所以使用“慰安妇”一词,是因为该词近年来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专用语汇,在国际讨论、历史研究及法律程序中专指亚太战争期间遭受日军蹂躏的性奴隶。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将“慰安妇”一词加引号,作为一个专题讨论用语使用。

关于“慰安妇”的报道在日本战败后曾零星见于一些回忆录、艺术作品、小说、杂志及电影、书刊^②,但直到1990年年初“慰安妇”索赔运动兴起,这一问题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议题。^③

① 本书英文版主要介绍日军从中国大陆强征“慰安妇”的历史及受害人的经历。关于战时日本帝国从当时的日本殖民地台湾征召的“慰安妇”的情况,此前已有英文书刊介绍。见日本律师联合会(日本弁護士連合会)编, *Investigative Report in Relation to Cases of Japan's Imperial Military "Comfort Women" of Taiwanese Descent*, Tokyo: Japan Federation of Bar Associations, 1997; 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慰安妇”,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网站, <http://www.twrf.org.tw/>; 以及 Yoshiaki Yoshimi,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 trans. Suzanne O'Bri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15—117.

② 关于日本战后出版的有关“慰安妇”的书刊,见 C. Sarah Soh,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p. 145—173.

③ 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争议,见 George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Japan's Brutal Regime of Enforced Prostitu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pp. 194—266; Soh, *Comfort Women*, pp. 29—77.